

聚集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与 城市增长机制的重构

——转轨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一个新古典模型的拓展

史晋川¹, 战明华²

(1.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杭州 310027; 2. 绍兴文理学院 经管学院, 绍兴 312000)

摘要:文章从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异质性、部门经济增长存在着聚集效应以及农村劳动力收入分配服从平均主义原则的假设出发, 构建了一个解释二元经济城市增长机制的拓展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 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及未来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 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而这种转移将在城市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同时进行。在一段时期内, 城市正规部门的发展将决定农村中高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则决定了农村中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但从长期看, 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取决于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中具有聚集效应的那一部分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且更有意义的是, 具有聚集效应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还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聚集效应; 城市化; 劳动力市场分割; 均衡

中图分类号:F290;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6)01-0005-15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 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方面, 出于实现规模经济与共享公共品等方面的考虑, 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会在空间上实现聚集, 这就表现为城市的产生与城市规模的扩张; 另一方面, 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使得要素的配置更为优化并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紧密关系促使人们纷纷展开关于城市增长机制的研究, 不过, 对已有理论的仔细分

收稿日期:2005-11-15

作者简介:史晋川(1957—), 男, 山西武晋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战明华(1971—), 男, 山东莱西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绍兴文理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

析可以发现,现有的理论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各种理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逻辑起点,不同的理论只是突出了影响城市增长的某一种因素;第二,各种理论的成立都有比较强的约束条件,而这些约束条件并不具有普遍性。当然,从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以便突出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来看,这些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对某一个具体对象的城市化进程规律进行比较全面的把握,那么从一个一般的逻辑起点出发,根据具体的约束条件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修订就是必须的了。

对我国而言,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在空间特征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受到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有必要结合实际,在对已有的城市增长理论进行重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城市化进程可看作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过程,而这又取决于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以及不同部门的相对工资水平,因而依据新古典的一般逻辑,对城市化进程的均衡分析就应主要着眼于在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约束下对不同部门相对工资水平决定因素的比较分析。为此,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已有的城市增长理论进行简要的回顾与评析;第二部分,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二元经济条件下构建一个拓展的城市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第三部分,利用拓展的城市增长模型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第四,对本文的基本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演化加以展望。

一、城市增长理论及其比较

总体上看,已有的城市增长理论可分为两类:一是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与城市的结构变迁角度来解释城市增长的机制;二是从城市聚集效应的角度来解释城市增长的机制。前者主要包括刘易斯(Arthur Lewis, 1954)、拉尼斯和费(Ranis 和 Fei, 1961)以及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 和 Todaro, 1970)等人的农村—城市劳动力转移城市增长模型,而克鲁格曼(Krugman, 1991)等人则利用核心—边缘理论提出了后一种城市增长机制。下面我们首先对这些理论进行比较分析,目的是区别其成立的前提条件与核心内涵。

1. 刘易斯—拉尼斯—费和托达罗模型

从发展中经济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出发,在忽略劳动力转移成本、技术不变、城市部门增长取决于社会储蓄水平和农村遵循平均收入分配准则等前提条件下,刘易斯、拉尼斯和费从要素转移的角度考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特征,其基本思想可通过图 1 来说明。根据刘易斯的假设,经济中存在着数量为 OA 的完全多余的劳动力,如果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则不会对农业产出造成任何影响。另外,由于农业中的劳动收入是平均分享的,因此如果假设农业的总产出为 Q,总劳动力数量为 L,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 OACD

阶段,工业部门只需支付 Q/L 水平的工资即可雇佣需要数量的劳动力,这使得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大于边际成本,从而有多余的利润实现以用于进一步的投资,这意味着劳动的需求曲线由 D_1 上移到 D_2 ,这一扩张过程可以一直持续到工业雇佣劳动力的数量达到 OA 水平为止。在接下来的 AB 阶段,工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超过 OA ,农业总产出下降,但其边际产出仍小于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显然,由于食物总量减少,社会人均食物拥有量也随之减少,因此要使工人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就必须通过给予工人一部分工业品来补偿,而这减少了工业中的利润剩余,从而使其吸收农业劳动力的速度不断下降。在工业劳动力数量超过 OB 水平后,农业中的边际产出大于工业部门,此时,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到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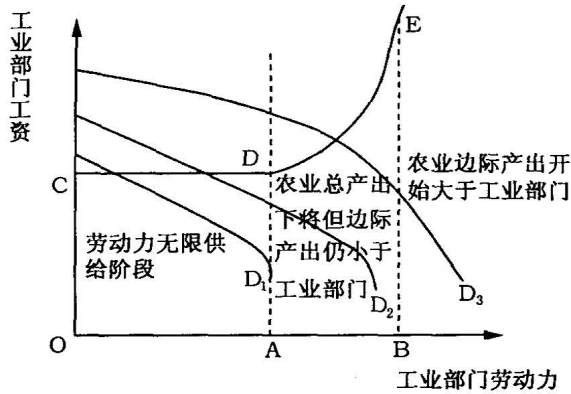


图1 刘易斯-拉尼斯-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局限性在于它的一些严格前提假设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现实。首先,在刘易斯等人看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本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但实际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城乡严重对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通过制订一些相应的制度来对城乡进行人为的割裂,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城乡分割制度的影响。这些制度的存在不仅提高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甚至有时是不可逾越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及以前的中国,由于城市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并成为城市的正式居民基本是不可能的。其次,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中,技术被假定为不变的,因而城市部门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可得性。显然,如果将这一假定放松,那么城市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将大大增强。

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相似,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也假定经济中存在着城市与农村两个部门,但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不同的是,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城市部门内部是非同质的,即城市部门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结构。这种结构的差异性体现在城市部门是由工资较高的城市正规部门、工

资相对较低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城市失业队伍所组成。由于出现了这一假设,因此农业部门劳动力在向城市部门转移时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于是,与确定性条件下的情况不同,此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均衡条件是:劳动力在农村部门的预期工资水平=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预期工资水平。

在这一均衡条件下,社会的就业结构与实际工资水平将呈现如图2所示的状态。由图2可见,由于存在着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总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出清情况下的均衡,在均衡时,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分别是 W 和 W_c^* 。从就业结构来看,有 AB 数量的人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 CD 数量的人在农村部门就业,其余劳动力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或处于失业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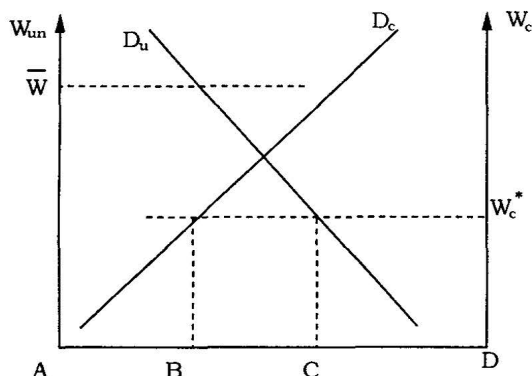


图2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两部门均衡

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相比,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优点是考虑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影响,但这一模型同样没有考虑技术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的影响。另外,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所隐含的一个假定是尽管城市中存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但这两个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并无区别,劳动力在这个模型中是同质的,每个人就业于城市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其机会是均等的。但在现实中,城市中的不同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差异往往是比较大的,而农村居民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也大多事前即可对自己所能就业的部门(正规与非正规)基本有所了解。这种事前的了解有时是因为城市对就业人员的户籍所在地的限制,有时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不能满足城市正规部门的要求。

2. 城市聚集经济模型

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共同之处在于均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由于在他们的模型中,部门的增长与部门就业人口的增长成正比,因此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也就包含了对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影响城市部门增长

的分析。不同于这一分析视角,米尔斯(Mills E. S, 1967)、亨德森(Henderson J, 1982)、沙里温(Sullivan A. M, 1983)、阿伯代尔·拉赫曼(Abdel-Rahman, 1990、1996、1993)和布森(Beeson, 1987)等人从企业聚集在城市中可以共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以及生产技术^①等外部经济性角度分析了城市中企业的聚集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决定性影响。

米尔斯(Mills E. S, 1967)首先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分析了聚集经济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及其城市增长的极限问题。在米尔斯的模型中,城市被简化为一个巨大的、生产出口品的生产函数,这个函数可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来表示: $Y=AL^aN^bK^c$,其中 Y、A、L、N、K 分别是产出、技术水平、劳动和资本。在米尔斯看来,城市的增长源于城市生产规模扩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性,它可由 $a+b+c>1$ 表示。正是由于这种规模经济性,才诱致劳动和资本实现在空间上的聚集,显然,如果不存在其他阻碍因素,这种聚集会不断持续下去。不过,如果我们将城市的交通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得到改变。按照米尔斯的观点,当城市就业人口在城市两个点(这两个点由企业和建筑物的相对位置所决定)之间往返上下班、城市建筑物(用于工人的居住)高度提高一倍的情况下单位费用不变和城市单位道路宽度输送客流量不变等三个假设条件下,如果城市人口增长一倍,那么显然交通道路宽度要扩大一倍,而为了同时解决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城市一部分建筑物必须建到原来城市的外围,而这增加了城市居民上下班的距离,因而城市交通设施不仅宽度要增加一倍而且长度也要相应延长。可见,城市居民扩大一倍,其所造成的交通运输设施投入的增加却远不止增加一倍,这就是城市扩张的规模非经济性,当这种规模非经济性与聚集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相抵消时,城市增长即告停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米尔斯的理论只是指出城市生产规模扩大所导致的聚集经济是城市增长的动因,但没有进一步考察这种聚集经济的个体来源。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在米尔斯分析的基础之上,沙利温(1983)建立了一个由产品单位成本函数表示的产业生产特征模型: $C=C(P_k, P_l(u), P_t(u))(X_0/X)^g$,这里: P_k 为资本价格、 $P_l(u)$ 为劳动价格、 $P_t(u)$ 为土地价格、 X 为某种产品的产出、 X_0 为某种产品的初始产出、 g 为规模报酬参数且 $g>0$ 、 u 为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显然,在沙利温的模型中,某种产品产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减少单位产品的成本,因此其聚集经济的来源即为产业聚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另外,在沙利温的模型中,到城市中心的距离通过影响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而影响单位产品的成本,因此这一模型中限制城市增长的机制与米尔斯是相同的,城市增长的极限值同样是交通设施建设的非规模经济性与聚集经济的规模经济性相互抵消时的均衡点。

米尔斯与沙利温的分析对象均是单个城市,亨德森(1982、1983、1996)等人则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城市系统。同米尔斯的模型相类似,亨德森也设计了

一个城市产出函数： $Y = Ag(N)N^bK^{b-1}$ ，这里： A 、 b 均为固定的参数， $g(N)$ 为规模经济参数且 $g'(N) > 0$ 。在一系列假设下，亨德森得出了城市增长在空间上的最佳模式是生产不同产品的产业应聚集在不同的城市区，而在产品生产链条上相关的产业聚集群应组成一个城市群的结论。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对交通运输设施成本的考虑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与米尔斯模型一样，交通运输的非规模经济性是促使城市增长停止的最主要原因；另外，由于生产不同产品的产业聚集在同一城市只会增加彼此的生产成本而不会产生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因此不同的产业群应分居不同的城市区域。

在亨德森之后，对城市增长的研究向更为复杂的系统和动态化方向不断发展，这一研究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有阿伯代尔·拉赫曼和布森以及赫尔斯利和沙利温(1991)等人。赫尔斯利和沙利温不仅解释了城市中心与次中心的形成机制，而且动态地分析了城市增长的过程。根据他们的分析结果，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专业分工还不完善，因此不同产业群的规模经济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促使工业区向大城市集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专业化程度提高，产业内规模经济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此时工业将向小城市转移，城市增长随之进入小城市快速成长发展时期。

比较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以及聚集经济理论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在分析角度与研究对象方面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的区别：第一，如果说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核心是强调了市场价格机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那么城市聚集经济理论则是从城市中企业聚集所产生的一些非市场化的现象来解释城市增长的机制；第二，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所研究的对象是劳动力个人或家庭工资最大化收入行为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聚集经济理论所分析的对象则是企业最大化利润行为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显然，这两种分析方法各有其优势，而如果能将这两种方法所研究的角度结合到一起，则对更全面地分析一个具体对象的城市化进程规律将是非常有益的。

二、城市增长——一个新古典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在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存在聚集效应的假定之下，融合以上两种分析方法的优点，我们这里开始重构一个关于城市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

1. 模型的基本假定

我们的基本假定如下：

(1)城市部门分为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两部分，两部门的区别主要在于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享受社会福利保障而非正规部门则没有这方面的权益；

(2)城市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素质与来源均不同——

正规部门要求劳动力素质较高,其来源主要是农村中受过高等或正规技术教育的劳动力;

(3)农村每期向城市正规部门输送一定数额的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市非正规部门是完全连通的;

(4)农村以家庭部门为劳动单位,劳动力的收益分配遵循的是平均原则;

(5)城市正规部门的生产存在聚集经济效应;

(6)城市的生活成本要高于农村且随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升,这种成本将越来越高;

(9)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城市部门产品的市场垄断性逐渐降低;

(10)不存在狭义的技术进步。

2. 分析过程

图3~图5给出了不同阶段城市正规部门(区域I)、城市非正规部门(区域II)和农村部门(区域III)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特征,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三种水平。我们先来考察图3所代表的初始阶段的情况。由图3可见,对于农村部门,根据假设,由于收入分配遵循的是平均原则,因此其劳动力的配置也是非市场化的,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包括两点:一是农业中实际劳动力的雇用量 L_{3r} 处于劳动边际产品收益 $MRP_{31}=0$ 的水平且是农村的全部劳动力;二是虽然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为0,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W_{31})并不为0,其大小等于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在明确了农村部门的状况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初始状态中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由图3中的区域II可见,在初始条件下,对于劳动力的雇用量,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是:实际劳动力雇用量(L_{2r})由劳动边际产品收益(MRP_{21})=劳动的边际成本(MFC)所决定,小于市场供需均衡的水平(L_{2e})。不过,由于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联通的,因此其工资决定机制具有如下特征:工资水平(W_{21})不会决定于劳动供给曲线(S_{22})所处的位置及劳动力的雇用量 L_{2r} ,而是取决于城市生活成本与农村生活成本的差距。考虑到城市非正规部门的边际产品收益要高于农村,因此初始状态下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 W_{21} 与农村部门工资水平 W_{31} 的差距应该足以弥补城市与农村生活成本的差距,故此,实际上城市非正规部门雇主所支付的工资(W_{2r})还要低于 W_{31} 的水平,其差距 $W_{31}-W_{2r}$ 刚好可以弥补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可见,在劳动力转移的初始阶段,城市非正规部门不仅能获得其自身劳动力市场所决定的超额利润,而且还能利用其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联通的优势获得多余的超额利润。最后来看一下城市正规部门的状况。根据图3中的区域I,除了由于城市正规部门具有较高产出效率所导致的劳动边际收益曲线较高外,与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情况相似,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雇用量(L_{1r})由 $MRP_{11}=MFC_{11}$ 所决定且小于市场均衡水平(L_{1e}),而其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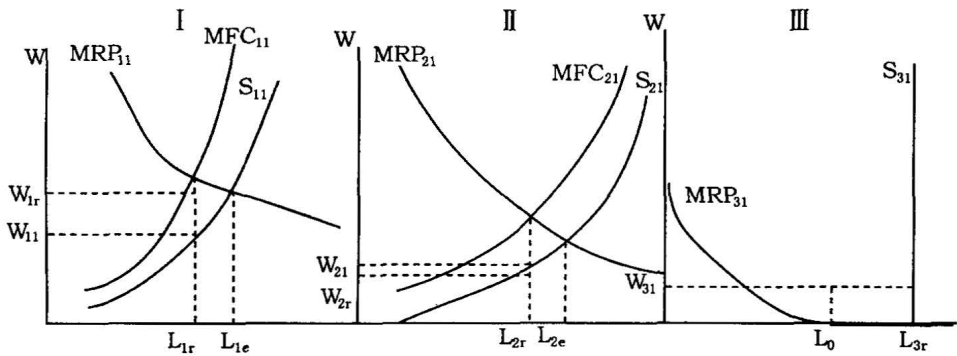


图3 初始阶段各部门劳动力市场均衡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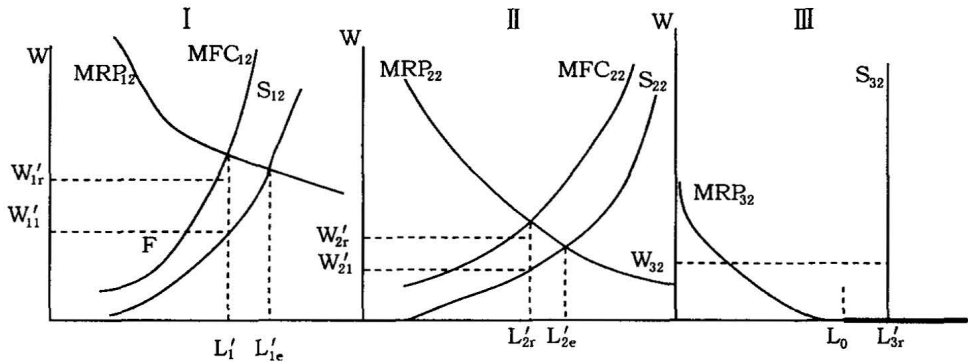


图4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各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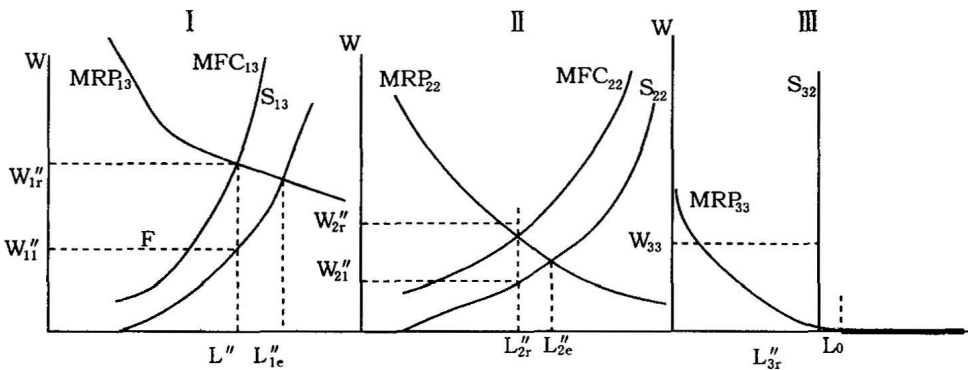


图5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各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特征

工资水平(W_{1r})也由劳动供给曲线及劳动雇佣量所决定(W_{11})。不过,与城市非正规部门相反的是,这里的实际工资水平要大于市场机制所决定的最优工资水平。按照假设,城市正规部门工资水平决定所表现出的这种特征的原因在于城市正规部门的职工享受城市非正规部门职工所不具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优惠。

再来看一下图4所表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各部门劳动力市场的

均衡特征。首先考察农村部门的情况。由于农村劳动力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部门,因此区域Ⅲ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S_{32} 向左移至仍大于 L_0 的 L'_{3r} 处,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影响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这种变化的惟一后果是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工资水平。其次,那么此时区域Ⅱ中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假设,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大致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随着产品市场的垄断性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 MRP_{22} 与初始阶段相比有所下降;第二,由于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我们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不变。这两个特征使得第一阶段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利润最大化工资水平 W'_{21} 要低于初始阶段的工资水平 W_{21} ,但实际上,由于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劳动力市场是联通的以及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得到了提高,因而城市非正规部门所支付的实际工资 W'_{2r} 反而要高于初始阶段的工资水平 W_{2r} ,这意味着与初始阶段相比,在第一阶段,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利润率有所下降(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因而总利润不一定下降)。当然,由于此时城市非正规部门所支付的实际工资 W'_{2r} 仍低于 $MRP_{22} = MFC_{22}$ 所决定的 0 利润工资水平,因而城市非正规部门仍可获得正利润。再次,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阶段城市正规部门的情况。(1)对 MRP_{12} 而言,一方面,聚集经济使得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产品市场垄断性的降低又使得产品的边际收益降低,因而看起来好像 MRP_{12} 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但由于这一阶段前一效应正处于上升阶段而后一效应尚不明显,因而实际上这一阶段的劳动边际收益曲线 MRP_{12} 将有所上升。(2)对劳动力的供给曲线 S_{12} 来说,由于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正规部门,因而 S_{12} 将向右移动。 S_{12} 的右移与 MRP_{12} 的上移相结合,使得城市正规部门不需要在增大劳动雇用量的同时减少最大化利润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在城市正规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 W''_{1r} 不会低于 W_{1r} 的条件下,其利润率水平不会降低。

最后来看一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三阶段各部门劳动力市场所呈现出的特征。由图 5 可见,随着农村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的劳动边际产出收益不再为 0,其工资水平也随平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而此时对城市非正规部门而言,一方面,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其劳动边际产品收益曲线 MRP_{22} 比第一阶段又有所降低,因而其利润最大化的工资水平 (W''_{21}) 也相应地出现某种程度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联通性,因而农村工资水平的上升将迫使城市非正规部门所实际支付的工资水平 (W''_{2r}) 也要比上一阶段有所提高,其实际值已超过了 0 利润点的工资水平,而要解决所面临的亏损问题,此时城市非正规部门惟有通过减少劳动的雇用量来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这意味着城市非正规部门开始衰退。对城市正规部门的分析过程与第一阶段相类似。现在来看一下 MRP_{13} 的变化。由于产品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因而此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效应可能与市场

竞争的负效应相抵消,这意味着 MRP_{13} 将基本保持不变而与第一阶段无异。不过,由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继续左移,因而第二阶段的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与第一阶段相比可能还会有所降低(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独立的),这表明在这一阶段,城市正规部门的利润率水平继续保持上升,也就是说,这一部门仍处于扩张阶段。

总结一下这一模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城市正规部门增长与城市非正规部门先增长后逐渐衰退的过程。这一变化的机理是,在农村收入分配遵循平均主义原则条件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涨,这一效应与产品市场竞争加剧相结合所产生的对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影响是,其工资水平也随之不断上涨,利润率水平逐渐降低,从而最终处于亏损状态。而由于具有聚集经济效应、劳动力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及生产率水平较高且有源源不断的一定数量的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涌入,因而即使在产品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城市正规部门在保持劳动力工资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仍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得利润率水平不至降低,从而一直呈现扩张的态势。从总体上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增长态势取决于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正规部门的转移速度。转移速度越快,农村低素质劳动力的数量越少,其可用于向城市非正规部门所提供的劳动力数量也就越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增长空间也就越小。

四、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及城市化的未来发展预测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与城乡严重分化阶段,时间跨度大约是从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所诱致的中小城镇快速发展阶段,时间跨度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以前;第三,市场机制日益成熟和经济结构转变所导致的政府推动的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在本部分中,我们将从前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在对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约束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考察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并据此对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1. 现阶段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条件

首先,从非农产业的部门划分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我国经济中的非农部门分为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前者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已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和个私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事业单位;后者则主要是指数量众多的小规模的乡镇与个私企业。与前面一样,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区别在于正规部门中的员工的收益除工资外,还享受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而非正规部门的员工则只获得合同上所规定的工资。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来看,目前

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如下两个途径实现向城市的转移：一是农村居民的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转为城市户籍，这部分劳动力大都在城市正规部门就职；二是农村未接受正规培训与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直接向城市转移，这部分劳动力绝大部分只能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职。由于这些劳动力的户籍仍然在农村原产地，因而他们随时都可辞掉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而返回农村务农，这表明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联通的。另外，对农村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组织形式使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分配遵循的不是边际原则，而是家庭平均原则。

2.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与未来发展趋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基本与前面拓展的理论模型相类似，因此下面我们将以拓展的理论模型作为分析的基础。

如果将城市化看作是农村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那么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就取决于城市部门的增长。先来看城市正规部门的情况。根据前面的分析，城市正规部门由于具有以下有利条件而可以始终处于增长状态：一是在初始的时候，城市正规部门拥有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与技术，因而其劳动产出效率即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较高；二是在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具有聚集效应，因而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边际收益不会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而降低；三是城市正规部门可以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因而使其实际工资水平比从企业获得的要高。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组织管理对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被我们忽略了。但实际上，组织管理水平是影响产出效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技术与要素投入。如果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原来的结论要做某些修正。这主要是因为，在城市正规部门内部，由于产权不清，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要比城市非正规部门低，而且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不是市场需求引致所产生的，因而其聚集效应也非常有限^④。在将这些因素纳入所考虑范畴后，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除非国有企业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改善产品结构而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否则城市正规部门的增长将呈现更为严重的不平衡性，而城市正规部门的增长将不仅要吸收由农村转移的劳动力，而且还要解决城市正规部门内部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失业人口。因此，仅从城市正规部门来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效果。改革效果越好，城市正规部门增长所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就可大量分配给农村，否则城市正规部门从农村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将是有限的；二是除国有企业外的城市正规部门的产出效率。在不考虑管理因素和人均单位资本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城市正规部门的产出效率取决于技术水平与聚集效应的大小，技术水平越高、聚集效应越大，城市正规部门的增长将越快，

城市化水平就会越高,城市化规模就会越大。

再来分析一下城市非正规部门。由理论部分可知,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增长取决于其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的比较。由于不存在聚集效应和产品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以及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正规部门转移,因而相对于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呈现不断萎缩的趋势。但是,从我国乡镇与个私企业的发展实际来看,这些部门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部分生产同一类型产品的乡镇与个私企业通过生产或销售网络而聚集在一起,这种类型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⑤;另一部分乡镇与个私企业则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因而没有享受任何聚集效应。可见,与城市正规部门一样,我国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不平衡性:对于具有聚集效应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它们可以承受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因而将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而对于不具有聚集效应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则将面临不断萎缩的现实。

不过,如果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就业,而且还意味着这些就业的劳动力将在城市做永久的居留,那么在分析过程中就应将城市的生活成本考虑进去。无疑,在将这一因素纳入所考虑范围之后,无论是城市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其实际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劳动力都会有所降低。由此我们可以预期的是,除非我国的大城市通过大规模的空间扩张使其生活成本(主要是土地要素的成本)相对农村不致过高,或者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城市部门(包括正规与非正规)的劳动边际收益曲线得到持续不断的提高,否则不断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将决定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只能在中小城市进行,而其增长进程将主要取决于具有聚集效应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

四、结 论

针对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五个统筹,而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减少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显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将在较长的时期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因此,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达到这一目的必由之路。不过,考虑到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经济结构均存在着诸多特殊之处,因此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必然遵循一些自身特有的规律,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将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与我们拓展的模型中的情形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分为通过事先接受高等教育和直接向城市部门转移两部分,除向城市转移的部门不同外,这两种转移方式的另一个重大

区别是前者还意味着户籍所在地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后者则大多不涉及户籍的转移。由于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同以及存在着户籍和福利制度的人为割裂，因而城市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通的，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则是统一的。

第二，对我国而言，与标准拓展模型的两个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在城市正规部门内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部分并不符合标准模型中所设定的城市正规部门具有聚集经济效应和技术水平高于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部门的条件，因而其劳动边际产品收益高于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部门的结论也就不再成立，而且如果再将管理因素纳入考虑的范畴，则结论会出现更严重的变异。另一方面，城市非正规部门内部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一部分中小乡镇与个私企业通过生产与销售网络而聚集在一起，表现出很强的聚集效应；而另一部分则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分散状态，不享受任何聚集经济效应，当然也难以进行有效的技术更新。

第三，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决于城市正规部门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效果、城市正规部门中其他部门以及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具有聚集效应的那部分的发展速度。可以预期的是，在不考虑产品市场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城市正规部门的发展取决于所享受的城市聚集效应大小、城市生活成本大小以及技术与产业的升级速度等因素；而具有聚集效应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则取决于所享受的区域聚集经济效应、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变化和技术与产业的升级速度等。

第四，关于我国城市进程的未来发展，考虑到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将持续提高，因而除非大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会超过这种成本的上升或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使土地要素成本不至于上升太快，否则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主要由中小城市来完成^①，而其条件是支撑城市化进程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必须在空间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聚集以具有聚集经济效应。不过，即便如此，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收益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业规模经济效益，那么对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分析表明，仅仅通过城市非正规部门来吸收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实现城市化是一个低层次的城市化进程。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城市非正规部门的低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只能向劳动力支付较低的工资，而由于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劳动力市场是联通的，因而这又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收益水平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升^②。可见，要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化经济并通过这一过程来消除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现有农村乡镇与个私企业必须加速实现技术与产业的升级。

注释：

①本文中的“技术进步”指的是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对应的“狭义技术进步”，前者指的是

除均质的资本、劳动以外的所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后者指的是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等硬技术方面的进步。

②劳动边际产品收益=劳动边际物质产品×产品的边际收益。

③关于各个阶段城市化进程的特征及其经济意义,具体可参见温铁军(1998、2001)、林毅夫(1994、2002)、裴小林(1999)、石忆邵(2003)、杨忠臣和陆玉麟(2003)以及钱陈(2004)等人的研究。

④聚集效应是许多企业为了通过共享市场、信息和技术等来降低成本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种经济现象,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空间上的分散性与增长能力使其显然不具有这种效应。

⑤例如,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很有特色的块状经济。

⑥对我国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城市正规部门还要担负安排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以及向城市转移的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任务,而这些劳动力供给都是刚性的。

⑦如果农村劳动力收益水平超过城市非正规部门,则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就会向农村回流,因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规模化。

参考文献:

- [1][美]德布拉吉·瑞(陶然等译). 发展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郭克莎.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J]. 中国社会科学,2000,(3):60~71.
- [3]林毅夫,蔡昉,李周. 对赶超战略的反思[J]. 战略与管理,1994,(6):1~12.
- [4]林毅夫. 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9(4):12~15.
- [5]石忆邵. 专业镇:中国小城镇发展的特色之路[J]. 城市规划,2003,27(7):27~31,50.
- [6]王小鲁,夏小林. 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1999,(9):22~29.
- [7]温铁军. 城乡二元体制矛盾的形成与城镇化发展战略探讨[J]. 山东农业管理学报,2001,(1):8~11.
- [8]温铁军.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陷阱[J]. 战略与管理,1998,(6):43~55.
- [9]杨忠臣,陆玉麟. 专业批发市场型小城镇的现状与未来[J]. 城市规划汇刊,2003,(5):90~92.
- [10]裴小林. 集体土地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和渐进转轨的根源[J]. 经济研究,1999,(6):45~51,70.
- [11]钱陈. 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一个研究综述[R].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 [12]钱陈. 民营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城镇化——以浙江省台州市城镇化为例[J]. 城市规划,2004,(3):40.
- [13]Mills E S.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an are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197~210.
- [14]Henderson J. Systems of cities in closed and open econom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82,12:325~350.
- [15]Sullivan A M.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external scale economies in produc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83,13:235~255.
- [16]Abdel-Rahman H M.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ypes, and sizes of cities[J]. Journal of

- Urban Economics, 1990, 27: 25~45.
- [17] Abdel-Rahman H M. When do cities specialize in productio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6, 26: 1~22.
- [18] Beeson P 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manufacturing 1959~1973[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87, 27: 183~199.
- [19] Henderson J V, A Mitra. The new landscape : Developers and edge cit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6, 26: 613~643.
- [20] Henderson J V. Industrial bases and city siz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 164~168.
- [21] Helsley R W, A M Sullivan. Urban subcenter formatio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1, 21: 255~275.

The Cluster Effect, Division of Labor Market and Restructuring of City Growth Mechanism ——A General Neo-classical Model about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to C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SHI Jin-chuan¹, ZHAN Ming-hua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oxing Institute,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hypothesis of the heterogeneity in labor market, cluster effect in different economic sections and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principle in rural areas, we construct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explain the city growth mechanism about the dual economy to discuss current citizen proce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our results, we argue that the main feature of Chinese citizen process is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to city. The cluster effect could be a vital factor for cities to affect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affect Chinese citizen process quality as well.

Key words: cluster effect; citizen process; division of the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责任编辑 许 柏)